

# 北京针灸国际传播历程回顾与研究述评\*

## ——以史料、经验、策略为中心

刘立安<sup>1</sup>, 张絮雨<sup>1</sup>, 孟月<sup>2</sup>, 李竺霖<sup>1</sup>, 周立群<sup>1,3</sup>, 孙永章<sup>4</sup>

(1.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 100029;

2.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北京 100700;

3.中国针灸学会, 北京 100700;

4.中华中医药学会, 北京 100029)

[摘要] 北京是我国针灸资源中心和对外传播中心, 设置于北京的各类针灸机构是引领针灸发展和国际化的主阵地。本文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国际传播相关文献的全面概览切入, 在回顾、梳理北京针灸国际传播历史脉络与相关重要研究基础上, 重点围绕史料、经验、策略3个方面, 分析了推进北京国际传播史研究推进的史料线索与要素集群, 点出了口述史料挖掘的紧迫性; 立足北京针灸国际传播在机构平台建设、人才输出、技术引领、文化融合、数字化传播等方面的简明经验举要, 发现了北京针灸国际传播史上呈现的技术先于文化、传播主体性稀释、文化殖民主义冲击等问题; 结合Deepseek、Sora、VisionPro等人工智能及虚拟现实技术发展时代背景, 展望及探讨了“中国针灸文化”体系构建、针灸传播“硬内容”与“软形式”并举、针灸传播口述史料完善、共生型针灸文化知识生态重构等策略及学术方向。

[关键词] 针灸; 国际传播; 北京; 史料; 针灸文化; 述评

[中图分类号] R2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DOI: 10.13862/j.cn43-1446/r.20251229.001

## A Review and Research of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History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in Beijing: Focusing on Historical Materials, Experiences, and Strategies

LIU Li'an<sup>1</sup>, ZHANG Xuyu<sup>1</sup>, MENG Yue<sup>2</sup>, LI Zhulin<sup>1</sup>

ZHOU Liqun<sup>1,3</sup>, SUN Yongzhang<sup>4</sup>

(1.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2.Dongzhimen Hospit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700;

3.China Association of Acupuncture-Moxibustion, Beijing 100700, China;

4.Chinese Associ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As the national hub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resources and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Beijing is home to various acupuncture institutions that lead the development and globalization of acupuncture nationwide. Starting with a comprehensive overview of relevant literature on Beijing's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is paper, on the basis of reviewing and sorting out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Beijing's acupunctur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and related key studies, focuses on three aspects—historical materials, experiences, and strategies. It analyzes the historical material clues and element clusters for advancing the research on Beijing's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history, and highlights the urgency of excavating oral historical materials. Based on the concise experi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in Beijing in terms of institutional platform construction, talent export, technological leadership, cultural integration, digital communication and other aspects, it identifies issues such as technology preceding culture,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2XCC019);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2024-JYB-JBZD-073);北京中医药大学“岐黄英才·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培养计划”(K2023D01)

通信作者:刘立安,男,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针灸史与针灸国际传播

dilution of communication subjectivity and the impact of cultural colonialism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and virtual reality (VR) technologies such as Deepseek, Sora, VisionPro, etc., this paper prospects and initially explores strategies and academic directions inclu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Chinese Acupuncture Culture" system, the simultaneous advancement of "hard content" and "soft forms" in acupuncture dissemination, the improvement of oral historical materials related to acupuncture disseminatio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a symbiotic knowledge ecosystem of acupuncture culture.

[Keywords]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Beij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acupuncture culture; academic review

针灸兼有技术和文化两种属性,对接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系,也是具代表性的原创技术,是中医药海外传播的“先锋”。中国针灸已传播到183个国家(地区)<sup>[1]</sup>,成为中医药海外传播的先行力量。北京作为国家政治文化中心与世界观察中国的首要窗口,不仅拥有丰富的针灸资源,更具备显著的国际传播优势:各驻京针灸机构既是全国针灸发展的决策核心,更是针灸国际化进程的主要推动力量;活跃于此的专家群体既是国内外针灸学术领域的骨干力量,也是针灸国际传播的“排头兵”。笔者基于档案文献、实物史料及口述史料系统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针灸国际传播的历史脉络,重点分析其在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节点与经验启示,总结首都针灸国际化进程中的创新举措与策略,旨在为新时代首都科技与文化传播“走出去”战略提供历史借鉴与现实参考。

## 1 把握全面——北京地区针灸国际传播史述略

1.1 北京针灸国际传播的历史脉络 新中国成立后,针灸技术以北京为原点辐射全球,传播态势良好,逐渐发展为兼具医疗价值与文化象征的国际化载体。北京针灸国际传播的实践历程,既是一部中医药创新发展的技术史,更是一部文明互鉴的交流史,其留下的丰富史料为提炼中国方案提供了珍贵样本。

针灸作为中医药核心载体,在北京率先构建国际传播体系。1951年,“红色针灸家”朱琏专著《新针灸学》面世,该书被译成朝、俄、越等多国文字出版,引发国际关注;同年,朱琏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牵头成立卫生部针灸实验所(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前身),该所迅速成为北京针灸国际传播的核心载体。该所开设高干外宾治疗室服务国际政要,派遣戴玉勤、叶心清、李志明、许式谦、孙振寰、杨甲等针灸专家赴苏联、蒙古国、也门、越南、柬埔寨、缅甸等国开展医疗外交<sup>[2]</sup>;同时举办针灸展览会并接待外宾参观<sup>[3]</sup>,还接待苏联、越南等国团体或个人来华学习针灸技术。这一时期,北京以卫生部针灸疗法实验所、中国中医研究院附属西苑医院针灸科、中国中医研究院外科研究所(后改称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和北京中医学院等机构为依托,通过医疗实践、技术输出、教育培训多维发力,初步构建起以北京为中心的针灸国际传播体系。此外,针刺麻醉手术于1958年首创成功,至1971年突破40万例。1971年为针灸国际化关键转折点。新华社首次向全球报道针刺麻醉成功案例,随后《纽约时报》副社长詹姆斯·罗斯顿在北京接受针灸治疗腹胀后撰文报道《现在让我告诉

你们我在北京的手术》,引发国际医学界关注。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观摩了针刺麻醉手术的全过程,并将《中国针刺麻醉》一书带回美国<sup>[4]</sup>,触发美国针灸热,美国针灸业也应运而生,1972年起美国各地出现针灸诊所。此后针灸以北京为起点全面播向世界,国际传播进一步深入。

改革开放以后,北京针灸国际教育规模进一步扩大。1983年,中国北京国际针灸培训中心成立;1984年,世界卫生组织确认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为其所属的传统医学合作中心;1989年,中国国际针灸考试中心在北京成立。这一时期,北京依托各针灸机构举办各种类型的国际针灸培训班、进修班、研究班、短期班60多期,为瑞典、瑞士、英国、美国、澳大利亚、荷兰、印度、德国、日本等近90个国家和地区培训了1000余名针灸人员,为针灸国际教育培训事业的正规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国际针灸培训班的学员学成回国后能广泛运用针灸疗法治疗疾病,而且有的学员还担任了所在国家的针灸组织负责人,有力地推动了针灸学术与文化的国际传播<sup>[5]</sup>。与此同时,北京地区牵头推动针灸技术国际标准的制定,如《针灸穴名国际化方案》(1982)、《标准针灸穴名方案》(1984)、《头针名国际标准化方案》(1984)、《标准针灸穴名与英美法日朝越对照》(1988)、《针灸穴名国际标准化手册》(1988)等针灸国际标准陆续制定。此外,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WFAS)于1987年在北京成立,其与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WFCMS)协同,在联络世界卫生组织(WHO)、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基础上,逐渐主导构建及发布了《针灸标准体系表》《针灸临床实践指南制定和评估的规范》等<sup>[6-9]</sup>。《世界针灸杂志》于1991年在北京创刊,加强了国内外针灸学术的交流与联系,提升了针灸医学价值的国际认知与影响力。

进入21世纪以来,针灸传播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由北京针灸界牵头申报的“中医针灸”项目于2010年入列“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sup>[7-8]</sup>。在两届北京奥运会期间<sup>[9-10]</sup>,针灸在发挥特色保健作用的基础上,将传统文化与首都文化传播到海外。到了新时代背景下,北京持续推动针灸国际化。2017年针灸铜人雕塑入驻WHO总部,侧映出针灸标识的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在当下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内含优秀文化的北京针灸医疗辐射沿线国家,仍不断地服务于首都国际化建设<sup>[11]</sup>。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首都国际传播,针灸已从北京传播到

183个国家(地区),现有103个WHO会员国认可使用针灸,国外中医和针灸从业人员有30万至50万人之众<sup>[12-15]</sup>。在首都国际传播历程中,北京针灸“走出去”之路上的大量史实为获取史料、总结经验、分析策略提供了现实基础。

1.2 北京针灸国际传播史关联研究举要 从基础史料而言,对北京国际传播中针灸类史料的系统整理研究一直“在路上”。目前,已完成的整理部分资料主要见于《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史》<sup>[1]</sup>、《中医文化传播学》<sup>[16]</sup>、《针灸在美国的多元化发展》<sup>[17]</sup>等文献中,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基础支撑。当前,以针灸为主体的传播史研究鲜见,相关的研究主要在针灸史和中医药文化传播两方面。

在针灸史研究方面,北京学者群体贡献显著:马继兴的《针灸学通史》<sup>[18]</sup>以文献为基,聚焦重要人物与事件;邓良月、王德深、黄龙祥等主导策划中国针灸“四大通鉴”<sup>[19-21]</sup>,奠定通史研究框架;王雪苔的《针灸史提纲》<sup>[22]</sup>创新性地以学科内部分类为线索,梳理针灸演进脉络;黄龙祥注重在文字史料基础上结合实物考察,针对实物调查著有《中国针灸史图鉴》<sup>[24]</sup>。王麟鹏通过文献与口述史料综合考证,还原北京针灸流派的传承脉络<sup>[25]</sup>。在针灸传播研究方面,学界已形成共识:针灸是中医药文化传播的优势载体,其载体价值亟待深度挖掘<sup>[26-27]</sup>。张其成<sup>[28]</sup>在论中医药文化传播现状与发展时,回顾了针灸医学取得的海外成就,思考了中医文化传播中针灸的优势作用,这为基于史料总结针灸国际传播经验提供了参考。张宗明触及了中医药跨文化传播的困境,认为“卡脖子”的点在于文化身份构建困难,提出针灸是中医药文化身份构建最成熟的载体<sup>[29]</sup>。这为考察针灸在国际传播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策略提供了一定指向。当下,Deepseek、Sora、VisionPro等人工智能及虚拟现实技术飞速发展<sup>[30-31]</sup>,相关研究方兴未艾,在“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中医文化传播业态正经历深刻变革。纵观研究脉络,北京是针灸国际传播史料生成与研究的双重中心。

## 2 突出重点——推进北京针灸国际传播史研究的基础要素分析

2.1 北京针灸国际传播史料延续性挖掘的线索分析 从北京针灸国际传播的历时脉络看,北京地区的针灸资源融入首都国际传播大局,形成了一些传播“阵地”,这些“阵地”是史料的集中“沉积区”。这些“阵地”即驻京的各类针灸传播相关机构,这些机构可以继续作为史料进一步挖掘的研究线索。史料来源可涉及这些机构相关文献记载、馆藏档案材料和人员口述资料。线索机构包括三类。(1)驻京高校与科研院所的相关机构:主要涵盖北京中医药大学(教育部)、中国中医科学院(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市)三大系统;(2)医疗机构的针灸相关科室:主要涵盖以上三大系统的附属医院针灸科、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疼痛医学中心、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的德国魁茨汀分院等;(3)针灸学术组织与社会团体:包括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中国针灸学会、北京针灸学会等。

2.2 以相关针灸机构为线索的针灸传播史料挖掘指向

2.2.1 高校与科研院所的针灸传播相关机构可挖掘的史料 上文这类高校与科研院所相关机构在国际工作中主要发挥的

作用是培养传播主体、组织学术交流活动,同时这些机构的学者是向国际传播学术与文化的主要力量。如: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多名校友在海外行医,成为传播北京针灸学术与特色的重要代表;北京中医药大学国际学院每年招收针灸方向留学生,毕业生回国后有效推动针灸的跨文化传播;隶属于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的北京国际针灸培训中心,并被认定为“世卫组织传统医学(针灸)合作中心”,常年面向海外从业人员举办技术培训。

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高校与科研院所与国外合办的中医药中心,正逐步成为中医药文化传播的前沿阵地。北京中医药大学中-俄中医药中心(圣彼得堡)推动针灸纳入俄罗斯医保体系;中-澳中医药中心(悉尼)开展8项获国际认证的针灸临床研究;瑞士中医药大学则聚焦欧洲地区,构建中医高等教育体系。这些机构以针灸为先导,通过临床、科研、教育及文化展示等全方位推进文化传播。

2.2.2 各类医疗机构的针灸相关科室可挖掘的史料 上文各类医疗机构的针灸相关科室可起到医疗资源国际输出、临床人才培养、技术展示等作用。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作为国内首批涉外医疗单位,其针灸科多次派遣医师赴越南、印尼、朝鲜、叙利亚、坦桑尼亚、日本、法国、德国、美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埃及、韩国等国家提供医疗服务;该院德国魁茨汀分院建院已30余年<sup>[32]</sup>,成功将针灸融入当地医疗与医保体系,并作为中德中医药中心持续促进文化交流。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医院与其北京针灸国际培训中心协同合作,在国际交流培训中起到临床带教的重要作用<sup>[3]</sup>。首都医科大学北京中医医院则承办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主办的临床类国际学术论坛,并成为援外医疗人员的重要派出基地<sup>[33-34]</sup>。此外,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疼痛医学中心在国内较早开展针刺麻醉,曾在尼克松访华期间为美国代表团进行演示,进而带动了国际“针灸热”的兴起<sup>[35]</sup>。

2.2.3 针灸学术组织与社会团体可挖掘的史料 此类机构在传播中主要担负学术、文化对外交流与技术国际标准制定等工作。如: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在京成立后,即致力于实施WHO传统医学战略、争取各国针灸合法地位、出版针灸学术刊物、制定和推广针灸国际标准等工作<sup>[36]</sup>);中国针灸学会、北京中医药学会也派员参加国家、北京市等政府或学术团体组织的出境针灸教学、培训和国际会议等<sup>[36-37]</sup>。

2.3 基于针灸传播史料全面考察的重点研究要素探骊 立足中医针灸学、历史学、文献学等学科,结合传播学特点对所搜集到材料进行全面分类整理,具体可分为国际人才教育与培训、国际学术与文化传播、国际医疗资源输出、针灸参与国际交往等大类。在史料进一步挖掘与全面考察基础上,突出重点,围绕关键人物及事件集群,即可抓出针灸国际传播史上的研究要素,进行专题探骊。兹举要如下:

2.3.1 针灸参与北京国际传播的关键人物 创建了卫生部针灸实验所的“红色针灸家”朱璉;被也门国王称赞为“东方神医”、越南总理范文同授予金质勋章的叶心清;五赴东南亚为印度尼西亚国家元首针灸的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杨甲三;主持北京国际培训中心工作的邓良月、程莘农;北京针灸援

外医疗代表人物田从豁、阎润茗、张大荣、陈绍武。

2.3.2 “中医针灸”申遗 从2006年国家“中医针灸”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全面启动,到2010年申遗成功。在此过程中北京的针灸专家学者是申报文本撰写与申报材料提交的主力军。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针灸学会多次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投票机构所在地组织针灸展览,以向世界传播针灸医学与文化<sup>[8]</sup>。首都专家领衔的针灸申遗历程也是文化的对话与交流过程。

2.3.3 北京奥运会与针灸文化 举办奥运会是北京国际传播历程中的关键事件。2008年,奥运村专门设有针灸治疗室,在开展针灸保健医疗的同时,悬挂针灸挂图及摆放针灸模型以展示文化,当时针灸受到国外运动员的广泛好评。2022年北京举办的冬奥会中,北京中医药大学首创的“10秒”中医药体验馆是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成功案例,其中针灸经络是代表性板块。

2.3.4 “一带一路”中的北京针灸 传统技术与文化逐渐走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如: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在中国中医药管理局、中国驻外使领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及当地政府和卫生部门的支持下,开展了“‘一带一路’中医药针灸风采行”系列活动,利用国际组织平台优势,凝聚各地团体会员以及医疗、教育、文化等多方力量,展开高端会晤、教育培训、义诊讲座、展览展示,为北京传统医学对外合作搭起了桥梁;此外,北京中医医院、广安门医院、东直门医院等机构的针灸科均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派出医生,开展医疗援助与交流<sup>[38-39]</sup>。

2.3.5 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与针灸国际标准制定 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是总部设在北京的国际性学术组织平台,其成立与发展本身即属北京国际化工作的一部分。1987年11月,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由中国牵头,在WHO的指导下,在北京成立。随着针灸的广泛传播,针灸的规范性引起全球业内专家的关注。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组织专家队伍开展了针灸标准化研究,参与了WHO“针灸术语标准化”“经穴部位国际标准”等文件的起草、制定及针灸标准地区性协议推广等工作,设计并主持国际针灸资格(水平)考试,出版了《国际针灸学教程》。

2.3.6 针灸与首都外交中心建设 从1955年苏联卫生部长科夫里金娜来京参观卫生部针灸疗法实验所开始,针灸即成为在外交中展示传统医疗技术与文化的有效元素。尼克松访华团观摩针刺麻醉、北京工美集团复制“针灸铜人”赠予WHO、外国元首接受针灸治疗等均是著名的外交史实<sup>[40-42]</sup>。至今,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体验馆每年承担大量国外访华和访京团接待任务,其中针灸是展示与体验的核心模块。

### 3 探索方向——北京针灸国际传播史研究的学术突破点刍议

#### 3.1 史料与经验方面

3.1.1 史料完善之方 目前,以针灸为主体的传播史专题研究鲜见,学界前辈在紧密相关的针灸史和中医药文化传播两方面,已取得及积累了丰硕成果,探寻了相关研究方法。结合针灸史和文化传播两方面研究,深化专门的传播史研究已具备成熟的条件。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尚有不少史料散在北

京中医高校校史馆资料、各医院院史馆资料、各类针灸学会的档案材料中,可进一步挖掘与整理。更重要的是,参与针灸申遗、国际标准制定等工作的学者仍活跃于首都针灸界,如耳针国际标准的牵头修订者周立群、赵百孝<sup>[43]</sup>;老一辈学者多有传人,如五赴东南亚的杨甲三的传人刘清国<sup>[44]</sup>、曾主持北京国际针灸培训中心的程莘农的嫡孙程凯现均任教于北京中医药大学<sup>[44]</sup>,阎润茗、田从豁等援外老中医均有学术继承人<sup>[45-46]</sup>,这使得口述史料挖掘具备可行性。一般而言,口述史料的挖掘具有一定紧迫性。同时口述史料可以与文献记载互证,可使针灸传播史料更加全面而立体。此外,有关针灸国际传播的部分外文文献也值得收集、完善,如由北京输出人才推动的针灸纳入美国医保体系相关的研究文献<sup>[47]</sup>。当然,立足考察外文文献及拓展相关调查史料,后续可探索分析海外民众对针灸文化的接受度、统计针灸在海外临床应用的疗效等。这对针灸跨文化传播具备先导性意义。

以全面占有史料为前提,即可探索首都针灸技术与文化国际传播阶段的划分与总结相应特色。以文化传播视角为例,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际“针灸热”,到2010年针灸申遗成功,再到针灸亮相奥运会;就技术传播角度来看,从早期北京针灸医师援外医疗到北京主导针灸技术国际标准制定,再到针灸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仍发挥国际医疗资源作用。抓住这些关键事件与历史节点,整体审视以这些节点为“航标”划割出的每一个历史阶段,结合当时的社会发展与国际交流大环境,即可以总结出针灸国际传播的历史经验。

3.1.2 历史经验初探 北京作为针灸国际传播中心的历史经验主要有5个方面:其一,机构建设。北京有多层次的针灸国际传播机构,1951年朱琏创建卫生部针灸疗法实验所(现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1983年成立北京国际针灸培训中心,1987年牵头组建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1989年设立中国国际针灸考试中心。这些机构通过高规格外宾诊疗、援外医疗派遣、国际培训及学术平台建设(如《世界针灸杂志》),形成了辐射全球的传播枢纽。

其二,人才输出。北京依托高校(如北京中医药大学、首都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医疗机构(如东直门医院、广安门医院)持续输送国际化针灸人才。早期派遣叶心清、杨甲等专家赴苏联、东南亚开展医疗外交;改革开放后通过国际培训中心规模化培养海外从业者,其中许多人成为各国针灸组织骨干。同时,北京中医药大学国际学院招收针灸留学生,推动“人才本土化”传播。

其三,技术引领。北京学者主导制定了针灸国际技术标准体系,如《针灸穴名国际化方案》(1982)、《标准针灸穴名方案》(1984)等,并通过WFAS与WHO合作发布《针灸临床实践指南》等权威文件。2010年由北京学界牵头推动“中医针灸”成功申遗,进一步确立技术正统性。

其四,文化传播多元融合。北京依托首都外交资源,将针灸融入世界大事之中,如:1972年尼克松访华观摩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针刺麻醉技术;2008年及2022年奥运会期间,奥运村针灸诊所、“10秒中医药体验馆”经络展示吸引国际运动员体验。

其五,数智技术赋能传播创新。北京依托首都科技资源集聚优势,积极探索人工智能(AI)、虚拟现实(VR/AR)等前沿科技与针灸传播的深度融合,引领针灸国际传播的数字化转型。如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建成针灸虚拟仿真教学中心,极大丰富了教学手段和内容<sup>[48]</sup>。

### 3.2 问题与策略方面

3.2.1 问题列举 历史之“镜”可谓一体两面,以之为照鉴,既可总结出正性的经验,也可发现负性的问题与短板。关注北京针灸国际传播遇到的问题、存在的短板,考察相应历史解决方案,思考国际传播的时代策略创新,是具备高度实用意义的。解离针灸的技术与文化两个属性来看,目前的问题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其一,针灸技术面临“去中国化”冲击;其二,针灸技术承载的中医文化乃至优秀中国传统文化尚有不足。其三,针灸文化国际传播要面对“文化殖民主义”质疑,导致其“走出去”的步伐远慢于针灸技术。具体而言,随着针灸国际化的推进,近年西方学界提出了“西方医学针刺”<sup>[49]</sup>,基于西方科学方法,围绕身体解剖结构,系统阐释、呈现了西医针刺理论与技术体系。这加速了针灸技术“去中国化”进程。在保持和传承技术传播的优势与经验基础上,应对理论技术层面“去中国化”的冲击,我们需认识到技术所承载的文化力量更为基本、更为持久、更为深沉。文化可使针灸所独具的“中国特色”得以强化,后续研究需要重点关注针灸文化方面,这可从传播的“硬内容”与“软形式”入手。

3.2.2 策略方向 (1)硬内容。所谓“硬内容”即瞄准强化针灸国际传播内容中文化成分,补足针灸国际化的文化之“钙”。这也是坚持中国针灸文化主体性的基础。在针灸的国际传播实践中,为追求跨文化理解的便捷性,常将蕴含深厚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经络及腧穴名称等针灸核心术语简化为字母和数字编号的组合,如将“手太阴肺经”简化为“LU”,以“LU 9”代指“太渊穴”的标准化策略。这种术语层面的“去语境化”处理,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技术传播的门槛,却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其承载的文化基因的流失。鉴于此,在传播过程中需兼顾文化信息的有效转译与呈现,德国汉学家文树德先生翻译中医典籍时的思想值得借鉴,即“古代医者‘自己的语言’是由当时的技术手段、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以及自然环境所塑造的”<sup>[50]</sup>。只有追溯及全面呈现这些内容,现代人才理解医学知识是如何产生的。具体解决策略应锚定于系统性的“中国针灸文化”体系构建,旨在强化传播中的“硬内容”——即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与有效呈现。具体而言,针灸文化体系的构建需兼顾经典性、时代性、国际性,首先,可综合使用中医药和针灸目录书,结合针灸典籍考证材料,选取代表性的针灸经典著作善本,全面占有针灸文化体系构建研究相关文献资料。而后,结合针灸出土文物,将这些针灸经典文献中文化相关论述内容进行分类梳理,得到针灸文化资料类编。并对类编中的各类资料内容分别按时间排序,进行历时贯通和共时对比考察,按门类分析、归纳针灸文化的基础内容。进而,在中华文明及中西方医学互鉴视域下,综合运用多学科方法,挖掘针灸文化体系与其他传统文化子系统的相通点,深思针灸的跨文化“特质”,对针灸文化内容进行现代化

阐释表达,逐步充实及呈现体系概貌。“中国针灸文化”体系构建重点可以从增量与提质两方面着力:

在针灸文化内容增量上,以价值观念、医学理念、择才传承、诊疗操作、器具文献5个方面为框架“子系统”挖掘与梳理针灸文化的主体内容。如:价值观念方面,可重点梳理阐释“阴平阳秘”“人命至重”“如待所贵”等内容;医学理念方面,可重点梳理阐释腧穴的名实体系、经络之奇正、针灸手法的纵横捭阖等内容;择才传承方面,可重点梳理阐释“语徐体静”“得其人乃传”及传承仪轨等内容;诊疗操作方面,可重点梳理阐释“望而知之”“坚者为宝”及力度与敏度等内容;器具文献方面,可重点梳理阐释“古九针”、灸具考、木人与铜人及传世针灸图等内容。

在文化内容提质上,针对上述针灸文化“子系统”,在东西方文明及医学互鉴视域下,对针灸文化进行更新性、创新性的现代化阐释表达。如运用现代哲学、认知科学或系统论语言重新诠释“阴阳平衡”“天人相应”等概念。结合现代解剖生理学,阐释经络腧穴的功能定位。提炼传统诊疗操作中蕴含的科学思维模式(如整体观、个体化、动态调整等)。

(2)软形式。所谓“软形式”,即在文化、文明的综合视域下,主体瞄准探索灵活的“春风化雨”式针灸文化传播形式。这是传播效能提升的重要途径。面对全球文化“新殖民主义”浪潮<sup>[51-52]</sup>,针灸的国际传播可在文化表达基础上,探索文明“浸润”。文化是人类群体所独有的,也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群体的要素,由此而言,文化即人化。从应用看,文化类似一种直达人心的精神思想说服力,重在抓住人心的过程中“化成天下”;换言之,文化也是一种“人本”魅力。早期人类用火照明,落在认知层面阐释,则人类需要在“看清”中走出黑暗与蒙昧状态,走出黑暗需“眼之明”看清万物的纹路,走出蒙昧需“心之明”看清万物的理法,心眼合用即产生不同于其他动物的文明,也逐渐催生“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文明标识性评价。相对而言,文明从形式上是更具“春风化雨”的启润性和“烛照玄幽”的利他性的。

由此展开探索,若向前看,针灸文化的传播研究需要扩展到中华文明研究“大视野”下,善于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相关成果为滋养,在文化与文明的互动生长中,以综合性展现形式实现传播增效。如笔者前期结合中华文明古代兵学中的“奇正”思想为先导<sup>[53]</sup>,整体审视“十二正经”与“奇经八脉”,对奇经八脉体系的内涵作了现代阐释表达及新媒体转化传播。若向后看,则针灸传播需要拥抱前沿技术。如面对Deepseek、Sora、VisionPro等模型应用的飞速发展,一方面,可以考察针灸文化中各子系统的二维线性逻辑联系,进一步集合形成三维的针灸文化知识体系集群,可尝试探索结合VisionPro等VR技术,实现针灸文化知识体系集群全息又立体地显像,可为针灸文化结合前沿技术的立体化、可视化呈现奠基。另一方面,在Deepseek基础上,可展望针灸乃至中医药垂直领域大模型建设,生成文创理念,进一步探索结合区块链技术的针灸“元宇宙”构建,并尝试“铸造”虚拟针灸文化产品(如数字藏品)等。例如目前,如蚂蚁科技集团融合区块链、虚拟仿真及全息投影等技术开发出的“鲸探”小程序与手机

应用软件,尝试推出马王堆出土的《导引图》数字藏品,即是以虚拟文创形式提升文化传播效能的例子<sup>[50]</sup>。这均是传播形式研究的可探索方向。

#### 4 小结与展望

北京地区针灸国际传播历程中形成了大量的史料,目前相关文本史料散见于针灸社会史、针灸学术史、针灸机构史等相关研究中,口述史料的挖掘是传播史料进一步完善的方向,且具有一定紧迫性。结合针灸史和文化传播两方面研究,深化专门的传播史研究已具备较好的可行性。同时,北京针灸国际传播在机构建设、人才输出、技术引领、多元融合、数智赋能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以北京针灸国际传播为“标本”,也凸显出针灸国际传播所面临的技术“去中国化”、系统性文化内涵薄弱、“文化殖民主义”冲击等共性问题。故在北京针灸国际化“外交驱动-技术主导-文化自觉”的动因主线中,文化跟上技术的步调,系统挖掘与构建“中国针灸文化”体系是当务之急。如针灸文化的具体传播则需要“硬内容”与“软形式”并举,并需“退身阔局”地和融于中华文明研究视域中。此外,基于跨文化传播学、医学人类学的“文化抵触根源”值得探索。更值得重视的是,当前正面临数字文明时代的生态重构。未来研究或应展望“技术-人文-生态”三位一体的共生型针灸文化知识体系;在技术上,开发具有文化嵌入性、数智化技术融入性的针灸操作范式;在人文上,建立跨文明的针灸文化解释学对话机制;在生态上,培育包容多元主体的针灸知识生产网络。如此,针灸才能超越“东方神秘主义”与“替代医学”的二元叙事,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实现从技术传播到价值共生的历史性跨越。

#### 参考文献

- [1] 张益嘉.中医针灸文化的海外传播[J].文化遗产,2024(3):24-30.
- [2] 张建枢,高军,纪玉英,等.北京援外医疗五十年[J].首都医药,2013,20(15):8-30.
- [3] 景向红,段玲.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所史[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21:42,145.
- [4] 曾文露,文席.针刺麻醉对针灸国际化的影响及其重要因素分析[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3(2):90-96.
- [5] 王宏才,邓良月,刘保延.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的历史[J].中国针灸,2014,34(12):1235-1237.
- [6] 刘保延.“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针灸国际标准”专刊序言从历史看未来:针灸标准发展脉络与展望[J].世界针灸杂志(英文版),2024,34(3):176-178.
- [7] “中医针灸”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J].中华中医药学刊,2010,28(12):2594.
- [8] 朱兵,黄龙祥,杨金生,等.“中医针灸”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文本解析[J].中国针灸,2011,31(3):193-197.
- [9] 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北京奥运会:中国传统医药与现代奥林匹克结合的开端[J].北京中医药,2008,27(8):673.

- [10] “健康中国观察”编辑部.中医之美惊艳冬奥[J].健康中国观察,2022(3):10-17.
- [11] 晏澜菲,孟妮.探索健康医疗服务的“北京模式”[N].国际商报,2023-12-11(2).
- [12] 陈少宗,巩昌镇,景向红,等.论不同时期针灸国际化的基本规律:兼论针灸的后国际化带来的思考[J].中国针灸,2022,42(10):1165-1169.
- [13] 谢依璇,闫世艳,陈波,等.新时代针灸的发展[J].科技导报,2023,41(14):42-50.
- [14] 常馨月,张宗明,李海英.2014—2019年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现状及思考[J].中医杂志,2020,61(23):2050-2055.
- [15] 梁丽娜,许凯,高云.中医药海外传播的现状与策略[J].世界中医药,2022,17(21):3121-3125.
- [16] 毛嘉陵.中医文化传播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4.
- [17] 王天芳.针灸在美国的多元化发展[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6.
- [18] 马继兴.针灸学通史[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
- [19] 邓良月.中国针灸经络通鉴[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4.
- [20] 王德深.中国针灸穴位通鉴[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4.
- [21] 黄龙祥.中国针灸刺灸法通鉴[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4.
- [22] 邓良月,黄龙祥.中国针灸证治通鉴[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4.
- [23] 王雪苔.针灸史提纲[R].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1981.
- [24] 黄龙祥.中国针灸史图鉴[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5.
- [25] 李嘉健,郭静,王麟鹏.浅析口述史与针灸流派传承研究[J].北京中医药,2015,34(6):458-460.
- [26] 王雪苔.针灸的国际化与现代化[J].中国针灸,2004,24(2):75-77.
- [27] 冯月季,赵微.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国家文化符号战略传播的反思与展望[J].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5(1):37-48.
- [28] 张其成.中医文化是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先行者:纪念习近平中医孔子学院讲话十周年[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1(2):78-82,139.
- [29] 乔宁宁,张宗明.中医文化身份的建构及其在跨文化传播中的价值适应[J].中医杂志,2016,57(7):541-544.
- [30] 令小雄.DeepSeek开启后ChatGPT时代:基于数字范式革新及其运演哲思[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5(2):59-67.
- [31] 张宏展,赵辉,于鹏.AI在大数据技术中的创新与应用[J].科技创新与应用,2024,14(21):16-19.
- [32] 戴京璋,马淑惠.对中医药国际合作与服务的思考与启示:从北京中医药大学德国魁茨汀医院的历史与发展谈起[J].中医导报,2017,23(17):1-7.
- [33]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消化中心.“北京国际消化病中西医诊疗高峰论坛”圆满结束[J].北京中医药,2013,32(9):705.

- [34] 苏鹏丽,徐鹏,李鲲,等.深化中国-阿拉伯国家中医药合作,共筑健康新丝路[J].亚太传统医药,2024,20(8):1-5.
- [35] 张青颖,陈波,公一因,等.针灸相关国际标准研究现状刍议[J].世界中医药,2021,16(5):819-825.
- [36] 中国针灸学会.中国针灸学会2021年国际学术活动计划[J].中国针灸,2021,41(4):428.
- [37] 郭天玲.北京中医学会史略[J].北京中医,2004,23(5):304-307.
- [38] 王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中医药国际交流的回顾与展望[J].北京中医药,2016,35(4):350-352.
- [39] 王金龙,王立立,宋渝丹,等.“一带一路”倡议下加强公共卫生国际合作的探讨[J].中国公共卫生管理,2021,37(1):110-114.
- [40] 黄涛.针灸铜人的源流考证[J].中国针灸,2018,38(8):891-894.
- [41] 亘火,唐军.苏加诺总统请中医治病:外交档案解密中国援外医疗队印尼之行[J].档案春秋,2010(9):4-8.
- [42] 刘清国.不皎不昧大医精诚:记当代中国针灸名家杨甲三教授[J].中国针灸,2008,28(4):297-301.
- [43] 刘立安,赵百孝,王磊,等.耳医学:从临证疗法到医学体系[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24,47(7):903-909.
- [44] 王莹莹,杨金生,程凯.国医大师程莘农三才针法精要[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3,19(9):1068-1070.
- [45] 陆永辉,张汝菁,王克键,等.闽润茗针刺手法和取穴特点探究[J].针灸临床杂志,2014,30(5):65-66.
- [46] 陶莎,田丛豁,王寅.田从豁老师针灸治疗荨麻疹浅析[J].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2008,17(3):348-349.
- [47] MILLER D W, ROSEEN E J, STONE J A M, et al. Incorporating acupuncture into American healthcare: Initiating a discussion on implementation science, the status of the field, and stakeholder considerations [J]. Glob Adv Health Med,2021,10:21649561211042574.
- [48] 杨星月,许安萍,张宇沁,等.虚拟仿真技术在经络腧穴学教学中的应用[J].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21,19(12):18-20.
- [49] FILSHIE J, WHITE A, CUMMINGS M.西方医学针刺:基于西方科学的方法[M].杜元灏,译.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20.
- [50] 龚倩倩,蒋辰雪.译作传心融通中外:访中医汉学家文树德教授[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6(3):171-174.
- [51] 聂敏里.当代中国哲学的国际化与主体意识的确立[J].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1):35-37.
- [52] 李包庚,吴艺瑾.全球化视域下的文化殖民主义批判[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24,37(1):9-17.
- [53] 刘立安,孟月,汤立新,等.参合古兵学文献的奇经八脉理论考证与解构[J].中医杂志,2020,61(1):10-12.
- [54] 冯凯睿.博物馆数字藏品的传播效果研究:基于鲸探受众评论的分析[J].中国民族博览,2024(23):237-240.
- (收稿日期:2025-07-16 编辑:刘国华)